



高適研究



余正松 著

中 华 书 局

高適研究

余正松 著

中華書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高适研究/余正松著. —北京:中华书局,2008.10

ISBN 978-7-101-06355-4

I. 高… II. 余… III. 高适(约700~765) — 唐诗 — 文学研究 IV. 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62962 号

-
- | | |
|------|--|
| 书 名 | 高适研究 |
| 著 者 | 余正松 |
| 责任编辑 | 李肇翔 |
| 出版发行 |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
| 印 刷 |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 |
| 版 次 | 2008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2008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
| 规 格 | 开本/700×1000 毫米 1/16
印张 17 插页 2 字数 200 千字 |
| 国际书号 | ISBN 978-7-101-06355-4 |
| 定 价 | 38.00 元 |
-

序

史称“有唐以来，诗人之达者，唯适而已”。而高适“以诗人为戎帅”，在众多的唐代诗人中，可谓“寥若晨星”。刘元海尝鄙随陆无武，绦灌无文，杜甫却这样赞扬高适：“总戎楚蜀应全未，方驾曹刘不啻过。”（《奉寄高常侍》）对这一颇为特殊之人物及其作品，历来研究甚为不够，只近年有彭兰《高适系年考证》、刘开扬《高适诗集编年笺注》、孙钦善《高适集校注》、周勋初《高适年谱》、谭优学《高适行年考》等著述，对其作品注释、考订、辑佚、编年，可谓“筚路蓝缕，以启山林”。但是，在此基础上对高适及其作品从思想和艺术等方面作全面深入细致的研究，还有待于学林进一步努力。余正松同志《高适研究》一书，即致力于此，读之甚感快慰。作者嘱余作序，辞弗获已，遂欣然命笔。

通观《高适研究》，在充分吸收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又不囿于前说，其创见发明，尤足称者，有以下几点：

首先，用时下流行的说法，是从纵和横的角度、由表及里的层次，拓宽和加强了研究的广度和深度。所谓“纵”者，即以其生平创作活动之先后次序为经，如书中考其生平，论其“两赴蓟北”、“从军河西”、“出镇淮南”、“为官西川”诸章，次第井然，条分缕析，使其“边塞诗人”之成长过程，前后思想之转化轨迹，昭然若揭。进而言之，“纵”还表现在溯源辨流上。如书中论“高适诗歌的渊源”、“高适的地位和影响”，探求自“风”、“骚”、“汉魏风骨”以来，诗歌传统之流变，以明高适对其继承、发展、形成自己独特风格之关系，以及在诗歌发展史上之影响，识见确当，信而有征。

所谓“横”者，即以与诗歌创作有关之事物为纬，从时代风云、社会变迁、军政业绩、游历登临，以及其他文体佳作，窥求对其诗歌创作影响之合力，掘绎思想艺术之要旨。读书中之论高适的政治思想，观出镇淮南、为官西川之军政活动，以及论其文赋创作等章，对于高适诗作一开始就走向现实主义创作道路之主客观因素，成为“开元时代诗坛上”“首先接触到农民疾苦的诗人”之思想基础，雄踞边塞诗派主将地

2 高适研究

位之历史必然,豁然可见,可谓知人论世,而非空谈臆断。

这种横向研究,还表现在对盛唐作家群中与之有关的作家之参照比较,如“高适和杜甫的交谊”、“高适与岑参诗风之异同”等章,通过他们的相互交往,切磋讨论,以显出他们为盛唐诗歌鼎盛所作之贡献,不同风格所呈之异彩,相得益彰,对比鲜明。

其次,资料翔实,论断精审。此书对高适研究中存在的一些长期湮灭失考或悬而未决之问题,钩稽史料,探幽发微,在翔实的资料基础上,得出比较精审的论断。如高适早年有南游荆襄之行,前人均未曾明确谈及,作者据高适《哭单父梁九少府》和梁冶《观汉水》等资料,判定高适早年曾同梁冶南游荆襄,发前人之未发,令人信服。又如高适开元十九年第一次出塞蓟北南归宋中,和天宝八载任封丘尉后送兵再到蓟北的确切时间,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此书抉微索隐,在丰富切实的材料基础上,判定高适第一次出塞蓟北归来的时间为开元二十一年冬,最晚在二十二年春即抵宋中。在封丘尉任上送兵到蓟北之时间为天宝十载秋由封丘出发,十一载春由蓟北南归,不久即辞去县尉之职,西游长安。似这类细微周密的考证尚有不少,此不备述。

复次,研究方法实事求是,立论公正稳妥。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由于左倾路线的干扰,存在着以非历史主义的观点来评论古代作家作品的倾向。研究者往往脱离具体的历史条件,苛求古人,对文学史上的种种复杂现象加以简单化,褒贬取舍都以实用主义为尺度,违背了列宁关于“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因而不能实事求是地评论作家作品,结论亦欠公正稳妥。

就高适研究而言,此一现象亦较突出,如对他第三次出塞哥舒幕府所作之边塞诗,不少论者认为是在歌颂侵略、屠杀的“不义之战”,予以否定,而此书在“高适从军河西的边塞诗述评”一章中,通过对唐、吐蕃双方九曲之战的起因、过程、结果的详密考证,对高适诗歌的深入分析,独申己之见解,纠正了学术界部分同志的这一偏向。又如高适晚年身为“戎帅”后,自两《唐书》至今,论者或指斥他“言浮其术”,或责其抵抗吐蕃“无能”,或称其诗歌内容“庸俗”,“对人民苦难不再关

心”云云。此书在“高适为官西川及诗作评价”等章中,据理驳正,既显古人潜德,又非虚妄溢美,持论公正稳妥。再如对于否定高适边塞诗中爱国主义精神之论点,著者紧密结合诗人生活之时代环境,力图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具体分析比较,对于爱国主义之内涵,其属于一定历史范畴之性质,高适诗歌值得肯定的爱国主义之进步意义等,均有独自の见解,论证细致切实,言之成理。

另外,此书特别注意从文学的角度来分析评论高适诗歌之艺术成就。如“高适诗歌雄放风格论析”、“高适诗歌雄放风格异变概观”、“高适诗歌的语言特色”三章,论列高适诗歌雄壮豪放和深沉悲凉之艺术风格的前后变化,构成此种风格之丰富鲜明的艺术形象,以及直抒胸臆的表现手法,谋篇布局,遣词造句之良苦用心,鞭辟入里,可谓知音。

当然,此书也还有不足之处:由于各章之间有相对的独立性,故从结构的整体性、连贯性来看,个别篇章的安排还不够紧凑和谐。另外,有的诗篇内容的理解、系年,也不无可以商榷之处。

总的说来,《高适研究》资料丰富,考证详明,论断精审,从不同角度和层次,对高适其人和诗歌创作进行了比较深入全面的研究,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不啻为唐代文学研究中的又一重要成果。

正松同志方当盛年,既曾参军,对军营生活有一定体验,又从萧涤非、董治安二先生研究古典文学数年,由他来著此书,自然游刃有余,所得甚多。鄙人年已古稀,又复多病,得知此书即将问世,颇有空谷足音之感。百尺竿头,尚望更进一步。幸甚。

刘开扬

丁卯大寒于成都

目 录

序	刘开扬(1)
全盛须臾那可论 高台曲池无复存 ——高适所处的时代	(1)
一卧东山三十春 晚年持节将楚兵 ——高适的生平	(10)
永愿拯刍蕘 孰云干鼎镬 ——高适政治思想透视	(42)
单车入燕赵 栖迟愧宝刀 ——高适两赴蓟北的边塞诗述评	(55)
一朝感推荐 万里从英髦 ——高适从军河西的边塞诗述评	(67)
秉钺知恩重 临戎觉命轻 ——高适出镇淮南及诗歌创作	(83)
驱传及远蕃 忧思郁难排 ——高适为官西川及诗作评价	(95)
骅骝开道路 鹰隼出风尘 ——高适诗歌雄放风格论析	(107)
暮天摇落伤怀抱 抚剑悲歌对秋草 ——高适诗歌雄放风格异变概观	(119)
美名人不及 佳句法如何 ——高适诗歌的语言特色	(132)
作赋同元叔 能诗非仲宣 ——高适的文赋创作	(144)

2 高适研究

脱略身外事 交游天下才

——高适和杜甫的交谊 (155)

高岑殊缓步 沈鲍得同行

——高适与岑参诗风之异同 (166)

缘情韵骚雅 纵横建安作

——高适诗歌的渊源 (177)

总戎楚蜀应全未 方驾曹刘不啻过

——高适的地位和影响 (194)

附录一:主要参考文献 (206)

附录二:边塞诗研究中若干问题刍议 (216)

论初唐边塞诗的发展和陈子昂的贡献 (231)

具备万物 横绝太空——论盛唐边塞诗的雄浑美 (245)

后 记 (261)

又 记 (262)

全盛须臾那可论 高台曲池无复存

——高适所处的时代

经历玄宗、肃宗、代宗三朝的高适,不但在当时政坛上曾以官至刺史、节度使而获“有唐以来,诗人之达者,唯适而已”^①的称誉,而且在盛唐诗坛上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诗人。他的诗,以洪钟大吕般的声音,唱出了他悲壮激昂的爱国热情,切望为国建功立业的豪情壮志,关心民生疾苦的进步思想,以及壮志难酬的深沉苦闷,因而比较深刻地反映出当时各种主要的社会矛盾。在盛唐诗坛上,把他列为仅次于李白、杜甫的重要诗人,是毫不为过的。

列宁指出:“在评价个人的社会活动时会发生的真正问题是:在什么条件下可以保证这种活动得以成功呢?”^②这就告诉我们,评价个人的社会活动,必须研究他的时代条件,从中找出时代给予他事业上的重要影响作用。因为一个杰出的作家,不但是他那个时代的一面镜子,而且首先是他那个时代的儿子。因此,研究高适其人的政治和文学活动,必须了解他所处的时代。

高适生活的时代,有哪些显著特点呢?

高适的时代,是唐王朝国力达到全盛的时代。

自公元618年李渊建立唐朝,经过唐太宗、唐高宗、武则天等统治者近百年的治理,社会经济不断发展。特别是712年唐玄宗李隆基即位后,结束了自中

① 刘昫《旧唐书·高适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0册,第3331页。

② 《什么是“人民之友”》,《列宁全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139页。

2 高适研究

宗、睿宗以来一直动荡不宁的政治局面,使封建政权得到进一步巩固。玄宗也颇能“励精图治”,这主要表现在他的“用人”和“纳谏”上。开元初,他任用姚崇、宋璟为相,姚崇“请抑权幸,爱爵赏,纳谏诤,却贡献,不与群臣褻狎,上皆纳之”^①。宋璟为相,“务在择人,随材授任,使百官各称其职。刑赏无私,敢犯颜直谏。上甚敬惮之,虽不合意,亦曲从之”^②。玄宗又下诏刷新吏治,整肃纪纲,戒奢崇俭,约束亲信。这样,至755年这四十多年的时期内,社会经济,特别是构成封建经济基础的农业,得到空前的发展。当时土地的开发是:“四海之内,高山绝壑,耒耜亦满。”^③垦田达数百万顷。兴修大小水利工程五十余处,使大量农田得到灌溉。这样,到开元末,“西京、东都米斛值钱不满二百,绢匹亦如之,海内富安,行者虽万里,不持寸兵”^④。就是边远之地,也与内地情况一样:“是时中国强盛,自安远门西尽唐境万二千里,间阎相望,桑麻翳野,天下称富庶者无如陇右。”^⑤这种繁荣的经济和比较安定的社会秩序,使人口的恢复也很迅速,由贞观末的不到三百万户,增至天宝十三载的九百多万户,五千二百八十多万人,为有唐一代的最高纪录。

在边境上,屯田区列,烽戍相望,外邦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对唐王朝的安全构成威胁,特别是唐在西域的势力,远及中亚,“丝绸之路”畅通无阻。同时,由于唐帝国同外国广泛的文化交流,和国内各民族文化的密切融合,以及对思想文化采取比较自由开放的政策,如儒、道、佛思想兼容并包等,使得科学文化也得到创造性的发展:天文、历法、医学、诗歌、音乐、舞蹈、书法、绘画等,无不取得划时代的成就,这就是后世所称的“盛唐气象”。

高适的时代,是各种社会矛盾逐步发展、激化的时代。

由于这种封建“盛世”是建立在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的基础之上的,因此,它一开始就不可避免地患上封建制度本身的顽症,即它是和衰败、腐朽同时并存的,阶级的矛盾和对抗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发展,而它本身是无法克服这些矛盾的。这可以说是开元、天宝年间社会由盛转衰的历史必然。

① 司马光《资治通鉴·玄宗开元元年》,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14册,第6690页。

② 司马光《资治通鉴·玄宗开元四年》,第14册,第6724页。

③ 元结《问进士第三》,《全唐文》卷三八〇,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4册,第3860页。

④ 司马光《资治通鉴·玄宗开元二十八年》,第15册,第6843页。

⑤ 司马光《资治通鉴·玄宗天宝十二载》,第15册,第6919页。

比如封建社会一个最根本的矛盾：土地的兼并和人民的逃亡，就是在开元年间，也大量存在。开元九年，宇文融上言：“天下户口逃移，巧伪甚众。”^①开元十二年，玄宗在《置劝农使安抚户口诏》中说：“水旱相仍，逋逃滋甚，自此成弊，至今患之。”开元二十四年，玄宗在《听逃户归首敕》中言及当时人民流离失所之状是“黎氓失业，户口凋零，忍弃粉榆，转徙他乡”^②。天宝以后，情况就更严重了。屡禁逃亡，而逃亡不止的根本原因，就是大地主的兼并，人民失去土地，只得逃亡。史言天宝年间：“法令弛坏，兼并之弊，有逾于汉成、哀之间。”^③阶级矛盾已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而唐玄宗本人在取得“开元之治”的一定成就后，他的骄奢心便逐渐增长起来，前期的英明被后期的昏庸所取代。为了纵情享受声色犬马的腐朽生活，他把大权交给老奸巨猾的李林甫。李林甫作宰相十九年，一是“媚事左右，迎合上意，以固其宠”；二是“杜绝言路，掩蔽聪明，以成其奸”；三是“妒贤嫉能，排抑胜己，以保其位”；四是“屡起大狱，诛逐贵臣，以张其势”^④。让这种五毒俱全的人把持要津，其政治之污浊可想而知。同时，玄宗后来连一点反面意见都听不进去了。开元二十四年，张九龄谏诤，被罢相。开元二十五年，监察御史周子谅上疏言时政得失，被杖于朝堂而死。“自是谏诤路绝矣！”^⑤

玄宗取得“开元之治”的主要原因，就是在于善于用人和纳谏。开元末和天宝年间，这两条路都被蔽塞了。又加上重用外戚，信任宦官；沉湎酒色，挥霍无度；妄求长生不死，大搞封建迷信活动等等恶行秕政，就更加快了把“开元之治”导向“天宝之乱”的速度。

高适的时代，是民族矛盾十分尖锐激烈，人民蒙受巨大灾难的时代。

由于唐帝国的统一和强盛，它的疆域大大地向外扩展了，因此它与其他地方民族政权的关系就更加密切。在这些关系中，有些基本是友好相处的，有的却经常诉诸战争。在战争中，唐王朝有时是侵略者，有时它又是被侵略者，情况很复杂。这些战争，虽然是民族融和过程中经常出现的斗争形式，但在特定的

① 司马光《资治通鉴·玄宗开元九年》，第14册，第6744页。

② 宋敏求《唐大诏令集》，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576—577页。

③ 杜佑《通典》卷二，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6页。

④ 司马光《资治通鉴·玄宗天宝十一载》，第15册，第6914页。

⑤ 司马光《资治通鉴·玄宗开元二十四年》，第15册，第6826页。

历史时期,它却给战争双方的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作为一个著名的边塞诗人,高适曾数度出塞,到过东北和西北边疆。在“安史之乱”中,又“以诗人为戎帅”,率师与叛军直接作战。他的边塞诗深刻地反映了边塞战场各种尖锐复杂的矛盾。为了比较准确地评价和研究高适的从军活动及其诗歌,有必要着重回顾一下开、天之际,唐王朝与其他民族政权的交往和斗争情况。

唐对东北边疆的奚和契丹,在开元中期以前,一直是友好相处的,但由于契丹内部的实力人物可突于^①一再杀害或胁迫其酋长,引起内乱。开元十八年,可突于又率契丹并胁迫奚众降于突厥,在突厥的支持下,不断南下侵掠唐王朝,唐被迫自卫反击,引起边境战争,直到开元二十二年底,才由张守珪平息此乱。契丹和奚在这场战争中遭到惨重损失,只好又归顺唐朝。开元末至天宝年间,唐与契丹和奚还不时发生战争,但这时战争的性质已发生根本变化,它是在唐玄宗支持下的一种对契丹和奚的欺侮、掠夺的战争。在这种不义的战争中,镇守东北边境的胡人将领安禄山、史思明等逐渐组成了一个以胡人和蕃化的汉人为主的叛乱集团,准备一旦时机成熟,夺取唐王朝的政权。

在南方,这种对少数民族的不义战争更具有典型性。天宝末年,宰相杨国忠等无端发兵进攻一向对唐友好的南诏。先是天宝十载,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进攻南诏,大败于泸南。“杨国忠遣御史分道捕人,连枷送诣军所”,“于是行者愁怨,父母妻子送之,所在哭声振野”^②。天宝十三载,剑南留后李宓又率兵七万击南诏,全军覆没,宓被俘。“杨国忠隐其败,更以捷闻,益发中国兵讨之,前后死者几二十万人”^③。结果,不但搞得国内民不堪命,怨声载道,而且逼得南诏和唐绝交,投靠吐蕃,和吐蕃联合进攻唐朝,给唐造成了严重的边患。

当然,在西南方,唐与吐蕃的斗争却比较复杂。唐在开元、天宝年间,国力强盛,恰好吐蕃在这段时间内也进入强盛时期,所以,它们在西域展开了长期的争夺战。在战争中,唐从确保安西四镇、维护通西域道路的战略角度出发,对吐蕃的进攻和侵掠进行回击,是必要和正义的,如后边我们将要谈到的哥舒翰收

① 司马光《资治通鉴》作“可突干”,此从《旧唐书·契丹传》。

② 司马光《资治通鉴·玄宗天宝十载》,第15册,第6907页。

③ 司马光《资治通鉴·玄宗天宝十三载》,第15册,第6927页。

复九曲的战斗等。但唐发动的某些战役,如开元二十五年河西节度使崔希逸袭吐蕃,“发兵自凉州南入吐蕃二千余里”^①,大大超出了自卫的范围,则是不义的。一般说来,“安史之乱”前,由于势均力敌,双方都无明显的优势,但天宝十四载后,吐蕃趁唐王朝全力对付安史叛军的机会,向唐大举进攻,给唐王朝造成了巨大的灾难。

在西北方,有回纥、东突厥、西突厥。开元、天宝年间,唐与回纥的关系比较友好,但与东突厥和西突厥的余部,还经常发生战争,有些是自卫性的,有些却是侵略性的。如东突厥可汗“默啜自则天世为中国患,朝廷旰食,倾天下之力不能克”^②,开元初,唐联合北方被默啜欺侮的拔曳固等族,攻灭默啜,就是必要的自卫行动。而“西突厥余部对唐朝,一般是愿意内附,取得唐的保护”,而唐却是“贪虐骄横,以征服者自居”^③,由此引起西突厥起兵反抗,不义的一方,就应是唐朝。

总之,在高适生活的时代,唐与四周的少数民族政权斗争十分尖锐复杂。在开元年间,由于内部政治比较清明,对外一般也能友好相处,不轻易进行战争。天宝年间,由于统治集团的腐朽骄奢,唐玄宗本人的喜好边功,“有吞四夷之志”^④,在对外方面,除了必要的自卫行动之外,还经常发动侵略战争,如对契丹和奚、南诏等。这样,不但在外交上日益陷入孤立,而且也进一步激化了尖锐复杂的内部矛盾,导致天下大乱。

天宝十四载(755),早已虎视眈眈的安禄山、史思明看到唐玄宗一伙已腐败不堪,反于范阳,凶残地向唐王朝扑来。这实际是在“叛乱”掩盖下的一场深刻的民族矛盾的总爆发,当然,也是阶级矛盾、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总爆发。

安史叛军以摧枯拉朽之势,横扫黄河南北,很快攻占了东都洛阳和京城长安,唐玄宗只好亡命四川。叛军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唐王朝付出巨大代价,经过历时七年多的战争,于代宗广德元年(763)才把“安史之乱”基本平息。但是,处于西南的吐蕃又趁唐精疲力竭之际,向唐大举进攻,并于广德元年十月攻入京城长安,抢掠焚毁十五日乃去。

① 司马光《资治通鉴·玄宗开元二十五年》,第15册,第6827页。

② 司马光《资治通鉴·玄宗开元四年》,第14册,第6724页。

③ 范文澜《中国通史》,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3册,第373页。

④ 司马光《资治通鉴·玄宗天宝六载》,第15册,第6889页。

原来与唐关系较好的回纥,这时见唐帝国分崩离析,也不买帐了。唐王朝为了换取回纥出兵平定“安史之乱”,只好答应“克城之日,土地、士庶归唐,金帛子女皆归回纥”^①的极为苛刻屈辱的条件。这还不算,回纥还要唐以叔侄之礼拜见,唐使者据理力争,竟被各鞭一百,一夕而死。

在南方,甚至大食、波斯也打到广州,“二国兵掠仓库、焚庐舍,浮海而去”^②。可见,大唐帝国自唐太宗时被四周少数民族尊为“天可汗”的优越地位,至此已是一落千丈了。

值得特别指出的是,这种尖锐激烈的民族矛盾冲突,给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祸。

安史叛军是“所过残灭”,攻下陈留后,“陈留将士降者夹道近万人,禄山皆杀之”^③。攻下长安后,“禄山命搜捕百官、宦者、宫女等,每获数百人,辄以兵卫送洛阳。王、侯、将、相扈从车驾,家留长安者,诛及婴孩”^④。

吐蕃攻入长安后,“剽掠府库市里,焚间舍,长安中萧然一空”,还“欲掠城中士、女、百工,整众归国”^⑤,只是由于郭子仪设疑兵恐吓,吐蕃才仓皇遁去。

回纥虽助唐打败叛军,但其行为与叛军无异:“回纥入东京,肆行杀略,死者万计,火累旬不灭。”^⑥

更令人发指的是,唐朝的官军也趁火打劫,坑害人民。乾元二年,唐军与史思明在邺城决战,唐军大败,“士卒所过剽掠,吏不能止,旬日方定”^⑦。宝应元年唐军攻入洛阳,“朔方、神策军亦以东京、郑、汴、汝州皆为贼境,所过掳掠,三月乃已。比屋荡尽,士民皆衣纸”^⑧。人民如此被敲骨吸髓地剥削,而大大小小的军阀却大发国难财,就是在安史乱平后,人民的苦难也未稍减。左拾遗独孤及在永泰元年上疏谈到这一情况时说:“今师兴不息十年矣,人之生产,空于杼

① 司马光《资治通鉴·肃宗至德二载》,第15册,第7034页。

② 司马光《资治通鉴·肃宗乾元元年》,第15册,第7062页。

③ 司马光《资治通鉴·玄宗天宝十四载》,第15册,第6937页。

④ 司马光《资治通鉴·肃宗至德元载》,第15册,第6980页。

⑤ 司马光《资治通鉴·代宗广德元年》,第15册,第7152—7153页。

⑥ 司马光《资治通鉴·肃宗宝应元年》,第15册,第7135页。

⑦ 司马光《资治通鉴·肃宗乾元二年》,第15册,第7069页。

⑧ 司马光《资治通鉴·肃宗宝应元年》,第15册,第7135页。

轴。拥兵者第馆亘街陌,奴婢厌酒肉,而贫人羸饿就役,剥肤及髓。长安城中白昼椎剽,吏不敢诘,官乱职废,将惰卒暴,百揆隳刺,如沸粥纷麻。”^①人民在外族侵略者和统治阶级的重重压榨下,不但生产遭到彻底破坏,而且死亡极为惨重,全国人口由安史乱前的五千多万,一下降到广德二年的一千六百多万^②。这个触目惊心的数字,足以说明这场浩劫给国家和人民造成的惨重损失。

综上所述,唐玄宗上台以后,接过经唐太宗、唐高宗、武则天等几代帝王惨淡经营的基业,经过开元年间的“励精图治”,确实一度达到了封建社会少有的“全盛”时代。但是,唐玄宗在后期的内政外交上,又表现得特别昏庸,这就完全抵消了他前期的成就,“全盛”的气象很快就被腐朽所代替。由“安史之乱”引起的民族矛盾、阶级矛盾、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总爆发,使显赫的大唐帝国犹如从天上一下摔到了地下,残破不堪。自此以后,唐王朝便急剧地由繁荣走向衰败,由强大走向削弱,由统一走向割据。这样鲜明的时代特征,正如高适在《古大梁行》中,以借古讽今的手法,满怀悲痛的感情所概括的那样:“全盛须臾那可论,高台曲池无复存!”昔日的盛世,如过眼云烟,一去不复返了。

以上是高适所处时代的政治概况。在文学领域,高适的时代,又是唐代诗坛革新取得完全胜利的时代。

唐初,诗坛上还弥漫着浮华绮靡的六朝诗风。高宗时,“初唐四杰”崛起于诗坛,他们对以上官仪为代表的宫体诗风,深表不满,提出了轻“绮碎”、重“骨气”的主张。他们的诗,题材、内容冲破了宫廷华筵的狭小天地,思想感情也比较真诚充实,但由于时代、个人生活经历的限制,他们的诗还未摆脱齐梁习气的影响。

继“四杰”之后,陈子昂“横制颓波”,在《修竹篇序》中,鲜明地提出了他的诗歌革新主张,他坚决反对“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的齐梁诗风,而把“风雅”、“兴寄”、“汉魏风骨”的光辉传统作为诗歌革新的标准。他的诗歌创作,如《感遇诗》三十八首、《蓟丘览古》等,正是体现了这种革新精神的主要作品。这之后,唐诗在陈子昂开创的道路上,健康地成长,终于迎来了盛唐诗坛上的辉煌胜利。

① 司马光《资治通鉴·代宗永泰元年》,第15册,第7173页。

② 司马光《资治通鉴·代宗广德二年》,第15册,第7171页。

开元、天宝年间,一方面,社会经历了四五十年的“全盛”期;另一方面,又是各种矛盾急剧斗争、社会由盛转衰的巨变期,因而在诗坛上,既产生了以豪放雄逸著称的伟大浪漫主义诗人李白,又孕育了以沉郁顿挫而名世的伟大现实主义诗人杜甫。不同流派也争奇斗艳:有以高适、岑参等为代表的边塞诗派,也有以孟浩然、王维等为代表的山水田园诗派。他们运用各种诗歌体裁,或抒写自己的宏伟抱负和远大理想;或倾泻自己强烈的爱国主义激情;或歌颂祖国的壮丽山河;或深刻揭露尖锐复杂的社会矛盾,使得唐诗的发展达到了繁荣的顶峰。

以上就是高适生活的时代,政坛和诗坛上的几个主要特征。那么,这样的时代对高适的文学和政治活动产生了什么影响呢?

第一,为高适掌握坚实的文学、军事知识创造了条件。高适的青壮年时期,正逢“开元之治”,这时的社会,秩序比较安定,人民生活比较富裕。高适虽然“家贫”,甚至“求丐取给”^①,但由于有这样有利的环境,他才有可能“十年守章句”(《淇上酬薛三据兼寄郭少府微》),潜心学习祖国优秀的文化知识。同时,他还谙读兵书,练习武艺,准备将来用自己的“安边书”、“纵横谟”来解除国家的边患。因此,他“二十解书剑,西游长安城。举头望君门,屈指取公卿”(《别韦参军》),对自己的文才武略充满了自信。另外,这样的环境,他也才有机会漫游四方,亲身体验到人民的经济生活、思想感情和意愿,并接触到其他许多杰出的诗人和艺术家,如伟大的诗人李白、杜甫,以及岑参、储光羲等,高适与他们有很深的交谊。著名的书法艺术家张旭、颜真卿等也是他的挚友。高适与他们经常“窗书任讨论”(《同熊少府题卢主簿茅斋》),这无疑对高适的文艺修养大有裨益。

后来,高适能在诗歌领域里独树一帜,在政治军事领域里独当一面,如果没有青少年时代刻苦攻读打下的基础,是不可能取得这样的成就的。

第二,培养了高适雄壮昂扬的英雄气概和为国建功立业的豪情壮志。开元、天宝年间,虽然存在各种各样的尖锐矛盾,但毕竟还维持着国家的强盛和统一,生活比较安定富裕,因此社会呈现出一派蓬勃向上的兴旺气象。一般中下层知识分子,都希望在这样的时代里,为国家、为自己建功立业。而高适在这一

^① 刘昫《旧唐书·高适传》,第10册,第3328页。

点上,表现得尤为突出,他“喜言王霸大略,务功名,尚节义”^①,对自己的理想和抱负有一种坚定奋发的追求热忱,发之为诗,显示出一种雄壮昂扬的英雄气概。在他许多豪迈自信的讴歌中,使人强烈感到诗人英雄精神的飞扬。这种现象,正是时代精神在高适身上的具体反映。

第三,火热的现实生活把高适锤炼成了一个杰出的诗人和独当一面的政治家。陈子昂倡导诗歌革新的主要功绩,就是在理论上廓清了梁、陈之气,它预示着唐诗发展的高潮必将到来。开元之际,诗坛上呈现风起云蒸的气势,并非偶然。在这个运动中,高适除了自己具有深厚的文学素养外,更主要的是火热的现实生活,把他锤炼成了一个杰出的诗人,为唐代诗歌革新的完全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

在现实政治斗争中,高适也是积极介入。他曾怀抱“万里不惜死”(《塞下曲》)的爱国激情,几次出塞,经历了长期金戈铁马的军旅生活。“安史之乱”的浩劫,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巨大的苦难。高适“以安危为己任”,在雷鸣电掣般的挽救民族危亡的战争烽火中,他进一步受到锻炼,充分显示出他的“王霸大略”。晚年,他“以诗人戎帅”^②独当一面。这样的环境和经历,把他培养成了一个“既是文学家,又是政治家”^③的特殊人物。

由此可见,任何一个杰出的人物,都不可能超然于时代之外,他所取得的成就,乃是他所处时代孕育、培养的结果。如果没有高适所面临的时代,没有他参加的风雷激荡的斗争生活,不仅不能表现出他的政治、军事才干,也不可能写出他那样“读之令人感慨”的“悲壮”之歌。

当然,这些时代特点只是高适凭借的外部条件。他在政治和文学领域成功的关键,还在于他在外部条件提供的环境中,自己艰苦的主观努力和创造性的劳动。为了说明这个问题,就有必要谈谈他的生平。

① 刘昫《旧唐书·高适传》,第10册,第3331页。

② 刘昫《旧唐书·高适传》,第10册,第3332页。

③ 郁贤皓《高适研究的可喜成果——评〈高适年谱〉》,《文学评论》1984年第5期。